

别老问孩子“进班子了没有”

我们确实是在一直关心孩子,但真正的关心应该是理解孩子、保护孩子、解放孩子,让孩子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。

评论员观察

□本报评论员 雒武

儿童节到了,孩子们在今天会受到格外的关注,通常父母会给孩子买礼物。无论是家人还是亲戚朋友,见了孩子常会关切地问,“最近学习怎么样”,“又获什么奖励了没有”,“有没有当上班干部”——所谓“进班子了没有”。有“好”的表现,大家都高兴,表现较差或者一般就

会受到各种鞭策或教育。大人有意无意的几句关心,让孩子本来快乐的节日一下变得沉重起来,而这种关心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中却无处不在。

为什么我们对孩子的问题总是这样一些问题,而不是孩子是否过得愉快?因为在绝大多数成人眼里,成绩比快乐更重要。大人们自以为这是一种关心,而实际上这些关心最终都成了孩子身上的压力。事实上这些关心大都是成人一厢情愿地施加到孩子身上的。就像绝大多

数家长都希望孩子当班干部,如果孩子自己不想当,就会被认为是不争气或没出息,不少家长甚至为了孩子“升官”,不惜走老师关系、拉同学选票,孩子们的想法本来单纯,而在家长这一强行关心的污染下,心理变得复杂而又沉重。有的学生干部、少先队干部,早早地“成熟”得像个大人,家长却常以此为豪,岂不知他们已牺牲了孩子的本真。

天真烂漫是儿童的本性,无忧无虑也应是每个儿童本来的状态,但因成年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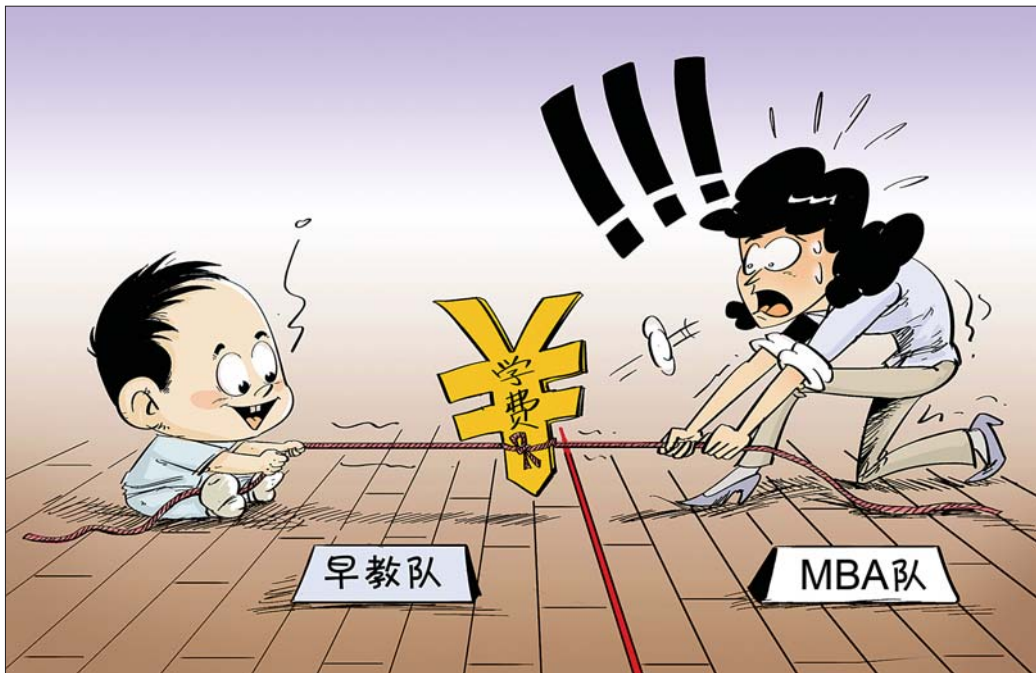
所给予的干扰、干预和干涉,孩子能天天无忧无虑的少之又少。过节时,家长都会或多或少送给孩子礼物,这常常意味着一种奖励,考试考好了奖,考级过关了奖,比赛得名次了奖。反之呢?不仅不奖还会加以呵斥。如此,本应只是表达亲情的礼物带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,让孩子学会违背自己意愿而看家长眼色行事。

近年来,我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,可是学校在抓素质教育的同时,因为考试的指挥棒依然存在,老师和家

长仍然会把考高分看作是第一位的,学生的压力不减反增。在这种压力下,孩子自己的空间被大大压缩,白天要聚精会神地上课,晚上回来要抓紧完成作业,周末又是家庭作业又是课外辅导,孩子就这样被驱赶着,没有多少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。家长望子成龙,愿望是好的,但大人们常常会忽略,孩子们现在最主要的“任务”是健康和快乐地成长。很多时候,让家长感到自豪的成绩却让孩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想象力和个性被扼杀,童年

应有的很多快乐被剥夺,孩子真正的童年时代大大缩短。

“六一”儿童节是一个国际节日,它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保障儿童的权益。当我们为孩子们庆祝节日的时候,看看本该无忧无虑的孩子却常常愁眉苦脸,我们是否有过扪心自问,我们是否侵害了孩子的权益?我们确实是在一直关心孩子,但真正的关心应该是理解孩子、保护孩子、解放孩子,让孩子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。



作者:勾霖

金娃娃

“一节课收费在140元至350元之间,如果报了两门课程,一年花费在2万元以上。”记者询问了南京十多家早教机构后发现,这样的收费标准非常普遍,要想让孩子上早教课,选择最少的课时和最便宜的价格,起码要掏5000元。“早教的费用贵得太离谱了,比我读个MBA都贵。”在南京一家银行工作的王女士说。(据新华社5月31日报道)

>>声音

今天的中国大学,在硬件设施以及论文数量上,与世界一流大学其实差距不大;真正拉开差距的,是大学理念、学术精神以及制度设计。过去我们常拿“钱”说事,似乎中国大学别的不差,只要有了这“阿堵物”就万事大吉了。现在终于明白,单靠钱是堆不出一流成果的。

——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。

世界各国对于金融业的资本和机构进入都有严格的规则,我们强调弱化金融业对民营资本的制度障碍,并非是说放松合理监管,而是希望给予民营资本更多“国民待遇”的同时,减少对民营资本的过度管制或制度歧视。

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说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中国的学界,唯发表主义已经泛滥成灾。论文和课题,就是学界的GDP,哪个单位发表量高,而且能在境外发论文,各种指标就上去了。

—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。

大学是个学术机构,应该按照学术卓越的方式来管理,怎样才能做到学术卓越就怎么做,但是行政化这种谁官大谁说了算,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追求卓越。

——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。

中国的现代化社会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,出去走走就发现我们上当了,以为全世界都像中国一样盖满了高楼,但外面并不是如此,这个现代化完全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概念。

——普利兹克奖得主、中国建筑师王澍说。

应努力改善父母与孩子长期不共同生活的现状,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,消除城乡就业、医疗、住房、教育等人为壁垒,使农民逐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,尽量满足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需要。同时引导产业向农村地区转移,尽量让农民在家门口上班,减少留守儿童数量。

——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梅志罡说。

■本版投稿邮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

>>个论

□五岳散人

这两天《环球时报》有一篇评论是这么说的:“中国人民应该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,这是世界各国都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,重要的是把腐败控制在民众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”,看完这个就不是什么倾倒、摔倒的问题了,直接晕倒才是正常反应。

话说腐败问题确实是全世界的难题,而且至今为止,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形态曾经完全解决过这个

问题,在可以眼见的将来也很难彻底解决。

《环球时报》这段话蛊惑人心的地方在于偷换了概念,把一定会有腐败的概念,偷换成了民众因为这种现实就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。话说即使这个道理成立,您倒是给个数字啊?比如说到底有多少人的腐败是大家是可以容忍的?我记得前段时间有官员说腐败的干部不到万分之一,那大概就是600人左右。而目前来说,每年一个省查处的干部都不止这个数吧?或者您跟我说说每年腐败的金额是多少才是能容忍的也行

啊,一千个亿还是一万个亿?您不能说我们需要容忍就容忍,然后还不说出一个可供容忍的标准。

当然,我估计谁也不敢说这个标准,因为这完全是胡扯。古语有云,取法乎上仅得乎中,取法乎中仅得乎下,高标准、严要求也不过是得到一个中不溜的结果,要是自己先给自己留下一个可以容忍的后门,往下的走向也就不堪问了。

实际上这种给腐败寻找理由的活动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,在早些年就有经济学家说,腐败是改革开放必须支付的成本之一。这话

其实在经济学上并非没有道理,而且如果没有权力的寻租,很多实行双轨制的做法不会得到更多的人指责,也就不会进一步完善法制、取消各种行业的进入门槛。但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成本是心甘情愿的,只是被迫支付的而已。

作为一个正常人是不是应该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?抱歉,对于这样的事儿应该是零容忍才是。从道理上说,腐败的胃口不会因为容忍而达到某个限度就停止,这种行为必然是那种不会餍足的。权力与钱都是越多越好啊。

广告这么野,管理这么软

编辑:

你好!

《齐鲁晚报》5月31日刊发的《高速路边“野广告牌”疯长》,报道了济南周边许多高速路边广告牌密布的现象,看了感到很迷惑不解。过去一直以为这些广告牌是有关部门负责安装的,闹了半天却是野广告,真是闻所未闻,难以置信。如此乱象,不

仅造成严重的视觉污染,影响到交通安全,还严重影响了高速路的规范秩序,影响了城市形象。更为重要的是,这些广告牌绝大多数都不合格,存在着安全隐患,极易引发交通事故。而且这些野广告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有的甚至好些年,高速路一通车就有了,怎么就没有相关部门过问整治,允许这种乱象由小到大,甚至到了随处可见的境地?司机想看指示牌,满目却是野广告,如果由此引发事故,这个责任该

由谁担负?“不好办”,“没有好的办法”不是野广告存在的理由。抓紧清理这些野广告没商量。我们不能总是发生了事故才引起重视,才去提高责任心。与其亡羊补牢,痛定思痛,不如未雨绸缪,防患于未然。只要态度端正,思想重视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读者:陶玉山

真是一场及时雨

编辑:
你好!

5月31日《齐鲁晚报》报道,30日山东省招考部门公布了2012年高考偶发事件处理办法,考生忘记或遗失了《准考证》可验相貌入场、忘带文具可请考务组提供,在考试中途提出想要喝开水,抑或是因为紧张想上厕所,可当即报告监考员等措施。

高考在即,本办法公布得好,对考生来说,真是一场及时雨。每年高考进行中,总有些意外情况发生。高考是关系到每个考生前途命运的大事,因遇到突发事件,考生

被拒之门外,或耽误时间造成考生恐慌而影响考试发挥,从而造成落榜或考不上理想的院校,会影响考生的前途。山东省招考部门的这种想考生之所想、急考生之所急、特事特办的做法,无疑给考生带来了福音,也彰显了人性化的关怀,值得其他省市学习、借鉴和效仿。当然,有了这些“特事特办”的途径,更要严格把关,防止有人利用这些途径作弊,损害高考的公平性。

读者:朱旭